

施蛰存

著



名家 读书系列

MINGJIA DUSHU

施蛰存读书

上

上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名家 读书系列

周明 主编

施蛰存读书

施蛰存 著 方未 选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蛰存读书 / 施蛰存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5

(名家读书系列 / 周明主编)

ISBN 978 - 7 - 5087 - 4401 - 8

I. ①施… II. ①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645 号

施蛰存读书

著 者：施蛰存

选 编：方 未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编辑部：(010) 66063028

发行部：(010) 66085300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邮购部：(010) 66081078

网 址：www. she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60mm × 22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第一本书

- 003/ 看书·读书
- 005/ 我的第一本书
- 010/ 我治什么“学”
- 013/ 十年治学方法实录
- 016/ 全集·文集·选集
- 018/ 重读“二梦”
- 020/ 祠庙·宫观·庵寺
- 022/ 堂名的起源
- 024/ 我写《唐诗百话》
- 026/ 读报雌黄
- 029/ 再说“坐”
- 031/ 关于潮州唱本的通信
- 033/ 为书叹息
- 038/ 樊楼异史
- 040/ 房内
- 042/ 菟羹

045/ 花的禅意

第二辑 小说中的对话

- 051/ 小说中的对话
- 057/ 关于《黄心大师》
- 061/ 小说的分类
- 069/ 古今中外的“小说”
- 072/ 说“话本”
- 084/ “变文”的“变”
- 096/ 《邻二》的逸文
- 098/ 《戴望舒译诗集》序
- 101/ 重印《边城》题记
- 104/ 重印《杂拌儿》题记
- 106/ 重印《赣第德》题记
- 108/ “管城三寸尚能雄”
- 111/ 读杨绛《洗澡》

第三辑 读古书

- 115/ 八股文
- 118/ 杂谈《金瓶梅》
- 122/ 《花间新集》序
- 124/ 汉乐府建置考
- 141/ 说“飞动”
- 148/ 说杜甫《戏为六绝句》
- 160/ 秋水轩诗词
- 164/ 《明人小品选》序

166/《四婵娟》注释本序

168/关于“竹枝词”

170/批《兰亭序》

173/禅学

第四辑 读翻译作品

179/奥维德及其《爱的艺术》

184/《外国独幕剧选》引言（上）

189/《外国独幕剧选》引言（中）

193/《外国独幕剧选》引言（下）

199/《域外文人日记抄》引言

202/从亚伦坡到海敏威

204/宫女与妓女

206/《自杀以前》译本题记

208/《称心如意》引言

270/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

216/《翻译文学集》第一卷编选说明

219/《翻译文学集》第二卷编选说明

221/《翻译文学集》第三卷编选说明

第一辑

我的第一本书

看书·读书

在口语中，我们总是说“看书”，但在书面文字中，却总是用“读书”。《新民晚报》有一版《读书乐》，《文汇报》有一个《读书周报》，北京三联书店有一个《读书》月刊。都用“读书”而不用“看书”。外国人，无论口语或书面，都用“读书”。我们说：“你近来看什么书？”外国人说：“你近来读什么书？”小学、中学和大学生，都是到学校里去“读书”，没有人说：“进学校去看书。”

根据现在的情况，小学到初中的学生，在语文课教室里，还是高声读课文的，高中以上的学生，连语文教材也只看不读了。中年以上的人，手里捧一本书，不论是本行专业书或是其他消遣书，差不多全是只看不读。只有读报小组的读报人，才高声读报，那是为别人服务，不是为自己而读。另外，有些人看到好的诗词，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来，我们称之为“吟诗”，不叫“读”。这是属于唱歌一类的。

因此，一般人只说“看书”而不说“读书”。其实，看书也是读书。读出声，叫作读；不出声，叫作看，只是表象的不同。每个人看书的时候，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下去的。因为不出声，旁人就以为他是看而不读，如果你能理解“看书”是默读，“读书”是朗读，这才可以理解“看书”也是“读书”。

书是语言文字的载体，语言文字是知识的载体。无论看书或读书，最终目的是获得这本书中语言文字所传达的知识。成年人读书不出声，只是对书看着，这是因为他们很容易通过语言文字获得知识。中小学生必须朗读课文，这是因为他们必须首先熟悉语言文字的作用。我们培养青少年的

语文知识，目的是帮助他们打好坚实的语文基础，使他们将来读书时，没有语文障碍，能正确地获得书中所传达的知识。

使青少年具有良好的语文知识基础，我以为，在初中结业以前，必须完成现代汉语的教学。这就是说，每一个初中毕业生，都能够正确地阅读一切当代书刊。在高中结业以前，必须完成古代汉语的教学。这就是说，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能够正确地阅读普通文言书刊。在文字方面，还必须熟悉繁体字。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海外华人的文书交流，日趋频繁。海外华人不用简化字，他们的文件，还有很多古汉语成分。我们今天的大学生，还有很多人不能阅读或写作适应于海外华人的文件。这是因为我们现今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水平太低，影响了他们对外所必须具有的语文使用能力。

我想在语文教学工作方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师提出两点建议，也同时向青少年提供两点语文学习的方法。

(1) 中小学语文教学应当以培养语文知识及写作、阅读能力为主要任务，通过语文的思想教育，只能作为次要任务。

应当多多指导并带领学生朗读，朗读能巩固记忆。无论白话文或文言文，都必须依照每句的语法结构诵读。一般人常说读文言文有腔调，这所谓腔调，其实就是语法结构的节奏。此外，还要训练学生读每一个字音要正确，使他们能辨别四声。

(2) 我希望高中语文教师选一些文言文作补充教材，最好是议论文，也希望高中生多看一些文言文的课外读物，以补充课堂教材的不足。

为培养语文水平而读书，只有在青少年时期，才有效益，过了中年，只能看书了。

1991年11月3日



我的第一本书

《书讯报》有一个专栏，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编辑同志来组稿，要我也写一篇，我就一口答应了。过了好多天，才有空闲执笔，想还掉这一项文债。可是，一想，这个栏目意义不很明白。我的第一本什么书呢？可以是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买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估量编者之意，大约是希望我谈谈我写的第一本书。不过，我又想，趁此机会，从三个方面都谈谈，也有趣味，可以作为我的一篇关于书的回忆记。

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我六岁，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就给我举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就送我到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里。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书包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就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元”本该是“玄”字，因为避清圣祖玄烨的讳，一切书本上所有的“玄”字，都改作“元”字。这是我到中学三四年级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到学馆，第一件事就是背书，要立在老师的书桌旁边，背对着老师，背诵昨天所教的四句。这第二天的功课当然很容易，背诵四句，新学会四句。但是第三天就要背诵八句了。这样滚雪球似的读下去，十多天以后，就感到很困难，常常背漏了几句。

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虽然不很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恐怕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不很反对了。

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我进中学后才能自己找书看，以为父亲的书，我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从来没想到自己去买书看。可是，我在高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常常讲曹操、刘备的故事，武松杀嫂的故事，才知道有一种书叫作“小说”。这种书，我父亲的十二个书箱中却一部也没有。于是我开始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积聚起来，星期日到东岳庙书摊上去买小说书看。第一部就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

父亲书箱里有几本关于词的书，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我也统统看过，并且学着填词。起先以为这些书都属于词曲，后来才知道词和曲是两种文学形式。可是东岳庙书摊上不卖词曲书，不用说曲没有，词也没有。于是我就到城里新开的云间古书处去问。那个年轻的老板兼店员请我自己到书架上去找。架上有一堆木版书，全是词曲。我几乎每本都想要买，可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只拣了部书名《蕉帕记》的曲子书。回家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的零本。

《蕉帕记》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戏剧书，也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古典戏剧书。下一个星期，又到云间古书处去，买到了一部有钱大昕藏书印的《北词广正谱》。这两部书引起了我涉猎曲学的兴趣。

这时候，我学作小说、诗词，不自知其幼稚，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日》，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我好几篇作品。但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我也不知道发表了文章可以得到稿费，只要给我发表，就很高兴了。

五四运动使我懂得了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许多新名词、新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是使我接触先秦诸子

的第一部书。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

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我十分崇拜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小说，我读的都是林琴南的文言译本，虽然觉得很好，但林琴南的译本当时大受批判，我也把狄更斯归入鸳鸯蝴蝶派，以为他是英国第三、四流的作家，不值得重视。

我既不再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而新文学刊物如沈雁冰编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在我看来，都是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我有自卑感，不敢去投稿。于是我一气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编为一集，题名《江干集》。这些小说都是在之江大学肄业时写的，而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故题作《江干集》。我请胡亚光画了封面，请王西神、姚鹃雏、高君定题了诗词，交松江印刷所排印了一百本。这是我自费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一集中的作品，文字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这一百本书，送亲戚朋友二十本，余下八十本，都委托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代售，因为有一个同乡在这家书局中当门市部经理。过了几个月，我去向同乡打听书的销售情况，据说只卖去十多本。又过了半年，文明书局歇业，我的同乡不知转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书不知下落，也没有结账，我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前几年，上海文研所的应国靖同志在上海图书馆书库中发现了一本。他借出看了一遍。承蒙他夸奖，认为这些粗糙的小说都是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夏丏尊译的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绵被》，觉得很受启发。这是一篇东方气息很浓重的小说，和欧洲作家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我模仿它的风格，写了一篇《绢子姑娘》。这时，沈雁冰已是我的老师，他的助理编辑徐调孚，也已是我的新朋友。我想，我已有条件去向《小说月报》投稿了。于是我把这篇小说交给徐调孚，他得到沈先生的同意，就给我发表了。这时，上海经营新文学书刊的

小书店正在多起来，许多出版商需要文稿。经朋友介绍，我把《绢子姑娘》再加上二三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凑足五万字，编成一本小说集，题名即为《绢子姑娘》，交给一家书店（现在连店名都忘了），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上市，这是我的第一本由出版商印行的小说集。《绢子姑娘》和《绵被》虽然故事情节不同，但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自己心里更明白，这是一种高超的模仿，还不能说是创作。因此，我也不承认它是我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

1928年，我和刘呐鸥、戴望舒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先后编刊《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两个刊物，这时我们的思想都“左”倾了。我写了二篇模仿苏联小说的《追》和《新教育》，算是我的普罗文艺创作。当时把这二篇小说列入我们的一套小丛书《今日文库》，书名即用《追》。这是六十四开本，一张报纸的小册子。《今日文库》的第二种是画室（冯雪峰）译的苏联诗歌集《流冰》。这两本小书，不久就被国民党目为宣扬赤化的文艺书，下令禁止发行。这是我第一本被禁止的小说集。不过，第一本之后，不再有第二本，因为我不再写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小说，所谓第一本，也就是唯一的一本。

我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是1929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的《上元灯》。但是，在初版本的《上元灯》里，还有一篇《牧歌》是模仿希腊牧歌的，算不得创作，因此我在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再版本《上元灯》中，把这篇《牧歌》也删去了。正确地说，我正式的第一本创作小说集应当是再版本《上元灯》。

“五四”新文学运动给我的教育，是重视文艺创作的“创”字。一个作家，必不能依傍或模仿别人的作品，以写作自己的作品。一篇小说，从故事、结构到景物描写，都必须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才算得是“创作”。我不愿意把初期的一些多少有模仿嫌疑的作品，老着脸皮说是我的创作，因此，我否定了《上元灯》以前的几个“第一本书”。

这一二年来，有几位青年作家的得奖小说，被读者检举，有抄袭嫌疑。有的是故事雷同，有的是描写风景山川部分，整段抄袭外国小说的译文。

这种现象，都有损于作者的品德。如果有一篇被评为好的小说，其中间有一段描写文字，证明为抄自别人著作的，那么读者就有理由可以怀疑这整篇小说是从许多不同的别人作品中抄袭来的。这样，即使它是一个得奖作品，读者也就不能信任那些评奖委员了。我希望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须珍惜自己的创作，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文艺创作水平。

1985年12月15日

我治什么“学”

《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

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司蒂芬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1928年到1937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衷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1937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选、历代文选。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1941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失了。